

习近平经济思想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济思想的弘扬发展

杨成

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经济思想坚持“两个结合”，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出重要原创性贡献。从经济思想史的视角看，中华文明在漫长历史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为现代经济治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注入了实践智慧，二者之间具有高度契合性。习近平经济思想既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又实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展现出民族性与时代性相统一的理论品格。

铸就经济发展价值新高度

中华文明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鲜明的价值追求，并在实践中将其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导向。我国先贤不仅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更注重对社会公平的维护。习近平经济思想通过创造性结合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经济伦理和价值追求，弘扬了富民厚生、义利兼顾的传统智慧，形成了兼顾效率与公平的现代经济伦理与价值追求。

升华“利以平民”的分配正义。“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我国先贤具有“以义制利”的深刻认识，批判“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强调“治国常有常，而利民为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分配决定于生产，又反作用于生产，“而最能促进生产的是能使一切社会成员尽可能全面地发展、保持和施展自己能力的那种分配方式”，这为理解分配问题提供了科学框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前提下，推动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不能少；共同富裕路上，一个不能掉队”的庄严宣誓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将传统理念升华为系统性的社会财富调节机制，彰显了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的优越性，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坚实保障。

激活“日新又新”的创新动能。中华民族向来崇尚创新创造。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蕴含着深厚的革新精神。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揭示了创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指明科学技术本身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内在的、作用不断强化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培育创新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基因”，提出“科技自立自强是促进发展大局的根本支撑”等一系列重要论断，既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革新精神，也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是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的观点的创新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确立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充分激发科技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了强劲动能。**

增强宏观经济治理新智慧

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发展，形成了独具特色且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可以为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现代国家治理的复杂实践，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中的治理智慧升华为现代治理理念，为超大规模国家的宏观经济治

理提供了重要方案，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

完善“执两用中”的调控艺术。《尚书》中“允执厥中”的治理理念，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中的调控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市场经济的高度复杂性，往往需要更加准确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成果，深刻揭示出现代国家的经济职能不仅限于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更在于通过宏观治理引导经济发展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科学运用“执两用中”的平衡智慧，区间调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等更加灵活有效。区间调控将宏观调控的目标界定为一个合理区间；定向调控精准发力，针对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进行针对性调控；相机调控则根据经济形势的变化灵活调整政策。这体现出“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治理境界，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为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

创新“食为政首”的保障体系。我国古代素有“食为政首”的认识。然而，传统安全体系受制于小农经济基础和技术条件，保障能力有限，作用主要局限于灾荒赈济。马克思主义认为，食物的生产是直接生产者的生存和一切生产的首要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实施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增强农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性，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凸显传统治理智慧与现代治理能力的辩证统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畅通“财物流通”的经济循环。市场是经济活动的基本平台。我国古人很早就有了“市者，可以知乱，可以知多寡”的观念。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循环等理论分析框架都注重经济循环畅通，推动国民经济形成螺旋

式上升的良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指出“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着力推动实现产权保护、公平竞争、质量标准等制度的统一，打破要素流动壁垒，打通物流、资金流、信息流堵点，促进传统意义上的联通转化为制度性、系统性的现代联通，努力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制度完备、治理完善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国内大循环的内在稳定性和长期成长性对冲国际循环的不确定性。**

开辟生态经济发展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习近平经济思想立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通过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的创造性结合，将朴素的哲学观念升华为系统的现代生态经济理论，转化为推动绿色生产力发展壮大的实践动力，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为突破传统发展观中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对立的旧有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

运用“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天人合一”构成了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哲学基石。《易经》中说“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蕴含着按照大自然规律活动的生态智慧。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揭示人与自然辩证统一关系，为“天人合一”提供了科学的客观物质循环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等重要论述，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魂魄，也蕴含着“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态文化的根脉，将环境视为同人类休戚与共的亲密伙伴，揭示生态文明对于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关键意义，突破了“增长极限论”的悲观预判，超越了部分西**

方环保主义将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割裂开来的思维窠臼，实现了生态经济观的根本性跃升。

发展“取之有度”的利用原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济思想强调“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如《孟子》中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体现了朴素的可持续发展思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自然资源作为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习近平经济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济思想中的“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原则并用于当代实践，创新性地将发展为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互促共进的绿色发展道路。比如，面对长江流域如何在发展中落实保护的实践难题，鲜明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引领沿江地区走上“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正确道路。这将“取之有度，用之有节”转化力可操作、可考核的区域协同治理方案，体现了在宏大时空尺度上统筹规划的系统性，有力矫正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非此即彼、不可兼得的落后观念，推动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得益彰，形成了加快培育和发展绿色生产力的中国经验。

激活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

中华文明自古以来就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交流合作，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从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到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中华文明天下大同的理想追求一以贯之。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习近平经济思想强调相互尊重、平等合作、互利共赢等，为解决全球性问题、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弘扬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悠久传统。古人说“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

之道也”，折射出古代中国的对外开放观念。然而，传统开放体系受历史条件限制，其开放程度、制度保障等有限，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详细论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等问题，阐释了经济全球化的本质、逻辑、过程，奠定了我们今天认识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两个大局”，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出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方法论，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通过落实好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等举措打造形态多样的开放高地，灵活务实拓展经贸伙伴关系网络，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不断释放制度型开放红利，促进国内国际两个市场更好联通，推动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让中国在国际合作中实现发展进步。**

彰显“天下为公”的世界情怀。中国先民素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美好期许，以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开展交流合作。习近平**总书记以高瞻远瞩的视野、观照人类的情怀，深刻把握世界各国普遍联系、相互依存的时代特征，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传承了“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回答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强调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历史文化、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合作机制开展广泛合作，为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动力，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and 模式，携手世界各国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
（原载5月8日《人民日报》）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善于「瞻前顾后」为民创造政绩

蓝汉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扬‘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精神，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前后相继、一以贯之地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要求。《之江新语》中这样说：“既要善于‘瞻前’，也要注意‘顾后’，团结带领本地本部门的干部群众在科学发展的轨道上奋力奔跑。”“瞻前顾后”，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的体现，意味着领导干部既要推进已有的科学部署和规划，也要为后续发展打好基础。今年，地方各级领导班子陆续换届。领导干部做到“瞻前顾后”，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意义重大。**

不少政绩观偏差，与领导干部缺乏“瞻前顾后”的接力意识有关。有的领导干部不是自己开头的不为，一定要刻上自己的政绩印记才干，喜欢标新立异，来回“翻烧饼”，热衷“换赛道”；有的盲目举债搞“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造成“前任的政绩，后任的包袱”。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一些领导干部将个人利益、个人升迁置于人民利益之上，将短期成效凌驾于事业发展、长远利益之上。坚持“瞻前顾后”，要求跳出“算小账”“算短期账”的局限，以长远眼光审视当下决策，从根本上克服华而不实、竭泽而渔的行为。

“瞻前顾后”体现的是对事业负责、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担当。“瞻前”就是尊重历史、承前启后。“瞻前”不是因循守旧、故步自封，而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总结经验、把握规律。面对前任留下的工作，要实事求是地分析，符合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的要坚持，不符合的要纠正。“瞻前”要求领导干部保持历史耐心，不因短期内难以完成而放弃，或者看不到成效而气馁。“顾后”就是着眼长远、利在千秋。“顾后”不是空谈未来、脱离实际，而是以前瞻性思维把握趋势，以负责任态度谋划发展。改革趋向纵深推进，越需要长远谋划。“顾后”要求领导干部做好基础性、战略性、长期性的工作，为长远发展蓄势赋能。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时刻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才能有“瞻前顾后”的格局和胸襟。上世纪60年代，河南林县干部群众历时近10年，凿壁穿石、开渠千里，修筑约1500公里长的“人工天河”，改变当地“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困境。当地的领导干部为什么要矢志不移推进红旗渠这项艰辛的工程？当时的林县委书记杨贵这样说，水就是林县的一切。在林县，就得为父老乡亲彻底解决缺水的问题。否则，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坚定的话语，道出了共产党人的为民担当。切实从人民利益出发，只要是有利于人民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干，不利于人民的事就坚决不干，牢牢把握住这样的价值标尺，就能摒弃个人的私心杂念，持之以恒地做成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业。**

运用好系统思维的方法论，才能做到“瞻前顾后”。比如，当前，各地推动高质量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任务十分紧迫。越是如此，越要善于从整体上谋划推动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精心培育、持续发力，创新生态、营商环境等都是在长期坚守、久久为功中逐步完善的。如果政策朝令夕改，就难以做成大事。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坚持统筹兼顾，处理好当前和长远等方面的关系。把求一时之效和求长远之效有机结合起来，多做当前有成效、长远可持续的事。在接力中创新、在创新中接力，结合新的实际、新的条件，以新思路、新举措把既定的科学目标、美好的工作蓝图变成现实，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

（原载5月7日《人民日报》）

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

戈艳霞

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特别是生活性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对“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作出具体安排。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需要深刻把握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的丰富内涵，推进生活性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作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打造高品质生活的重要领域，生活性服务业一头连着实体经济，一头连着民生福祉，领域宽、范围广，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新时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更加广泛，居民消费倾向和消费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在衣食住行等基本需求得到满足后，文娱体验、

健康美容等服务消费成为消费新趋势。顺应这一趋势，我国积极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比如，“十三五”规划纲要、“十四五”规划纲要对生活性服务业发展作出部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要求“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在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下，我国生活性服务业规模稳步扩大、质效持续提升，在支撑产业发展、满足民生需求、带动就业扩容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五五”时期是服务消费的加速发展期，生活性服务业发展蕴含巨大潜力。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既是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释放内需潜力的内在要求，也是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重要之举。

围绕居民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发展，扩大升级类服务供

给。着眼人们不断升级的消费需求，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以供给质量跃升回应消费升级期待，既是提振消费活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产业能级的战略选择。可培育智能化、定制化、体验式体育消费新模式，推动赛事经济、冰雪经济高质量发展；实施零售业创新提升工程，支持有条件的城市“一店一策”打造消费新场景；等等。

围绕居民多样化消费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服务消费将呈现日益鲜明的个性化、细分化趋势。做精做细个性化服务，以供给的多样化对接需求的个性化、细分化，是精准满足消费新期待、畅通消费微循环的主要抓手，也是充分释放消费红利、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的重要路径。为此，可量身打造卫生健康、家居家装、心理咨询、智能陪伴等多样化、专业化服务。比如，可鼓励医疗卫

生机构开展个性化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供健康评估、慢病管理、上门巡诊、用药指导等服务；也可拓展新型到家服务，提升从业人员素质和专业化服务水平。

围绕居民日常生活基本需求，促进生活性服务业便利化发展，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随着生活节奏加快，居民对获取生活服务的时间和空间要求更高。推动基本需求类服务更加普惠优质，提升服务的便利化供给对接“就近需求”，既能够实现服务可及，更好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也能够将潜在需求转化为即期消费，充分激发内需活力，同时能够优化城乡功能，提升治理效能。可通过健全县乡村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发展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服务等举措，推动人民群众获得感持续提升。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载5月7日《人民日报》）

深化煤矿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张俊琦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法规，明确企业的环保责任；“双碳”目标下，环保标准持续提升级，倒逼企业加大环保投入。地方政府通过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推行环境信用评价等措施，引导煤矿企业落实环保主体责任。然而，部分地区仍存在监管不严、处罚力度不足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强化跨部门协同执法，形成“源头严防、过程严管、后果严惩”的全链条监管体系。

未来深化煤矿环保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

1. 技术革命的深化与系统集成

从单一技术到系统解决方案：未来不仅需要继续研发和应用单项技术（如充填开采、水处理），更要强调技术的系统集成与协同。例如，构建“煤-水-气-热-矸”五位一体的矿区资源循环利用系统，实现废弃物的资源化、能源化全利用。

数字化与智能化的赋能：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智慧环保”平台。实现对矿区生态环境（如地表变形、地下水、空气质量）的实时、精准、智能监测、预警与调控，实现污染预防和生态损害的快速修复。

CCUS（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技术的攻关与示范：针对煤炭利用端无法完全替代的领域（如钢铁、化工），加快推进CCUS技术的规模化、商业化应用，这是实现煤炭清洁低碳利用、服务国家“双碳”目标的关键技术拼图。

2. 政策与市场机制的协同创新

强化全生命周期环境成本内部化：通过更严格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源税、环境税等经济手段，将开采活动造成的生态破坏、污染治理和历史遗留问题修复成本，真实地纳入煤炭生产成本和企业决策中。

完善生态补偿与绿色发展激励机制：建立跨区域、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保护生态环境的矿区获得合理回报。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对实施绿色开采、循环经济、生态修复的企业提供优惠信贷、债券发行等支持。

建立“环境、社会、治理”（ESG）评价体系：将煤矿企业的环保表现、社区关系、安全生产、转型努力等纳入统一的ESG评价，并与融资、信贷、项目审批、市场准入等挂钩，形成市场化约束和激励。

3. 产业转型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深度融合

超越“就煤谈煤”，推动矿区系统性转型：将煤矿环保问题置于资源型地区整体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于资源枯竭或临近退出的矿区，提前规划布局接续产业，利用废弃矿井、闲置土地和工业设施，发展可再生能源（光伏、地热）、储能、数据中心、现代农业、生态旅游等新业态，实现“矿退城兴”、“矿退绿进”。

构建“煤炭+”多元融合产业生态：鼓励大型煤炭企业依托其能源生产、土地资源、电网接入等优势，战略布局“煤炭+新能源”、“煤炭+新材料”、“煤炭+氢能”等融合产业，将传统矿区改造为综合能源供应基地和零碳低碳产业园区。例如，神华集团等大型能源企业已布局风光储一体化项

目，探索“煤矿+新能源”协同发展模式，为行业转型提供示范。

以人为本，保障公正转型：在产业转型过程中，必须高度重视煤矿职工的再就业培训、社会保障和社区稳定，避免因环保和产能引发社会问题，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

4. 构建全社会共治的监督与参与体系

强化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建立矿区环境信息强制披露制度，保障周边社区和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评估和监督。推动产业链责任延伸：鼓励下游用煤企业（如电厂、钢厂）优先采购来自绿色矿山、环保表现优异的煤炭企业的产品，通过供应链传递环保压力和市场动力。

总而言之，解决煤矿环保问题，已从“末端治理”和“过程控制”阶段，进入到“源头预防、系统治理、绿色转型”的新阶段。它不再仅仅是环保部门或煤炭行业的技术与管理命题，而是一场涉及技术创新、政策改革、产业重构、区域振兴和社会治理的深刻系统性变革。

煤矿环保问题的解决，不仅关乎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更关系到能源安全和社会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未来，需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完善政策体系、推动产业转型，将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煤矿生产全链条，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这既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践行，也是煤炭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者单位：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大同有限公司）